

延安

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37-1947

朱鸿召 著

★ 再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 展示一个你不知道的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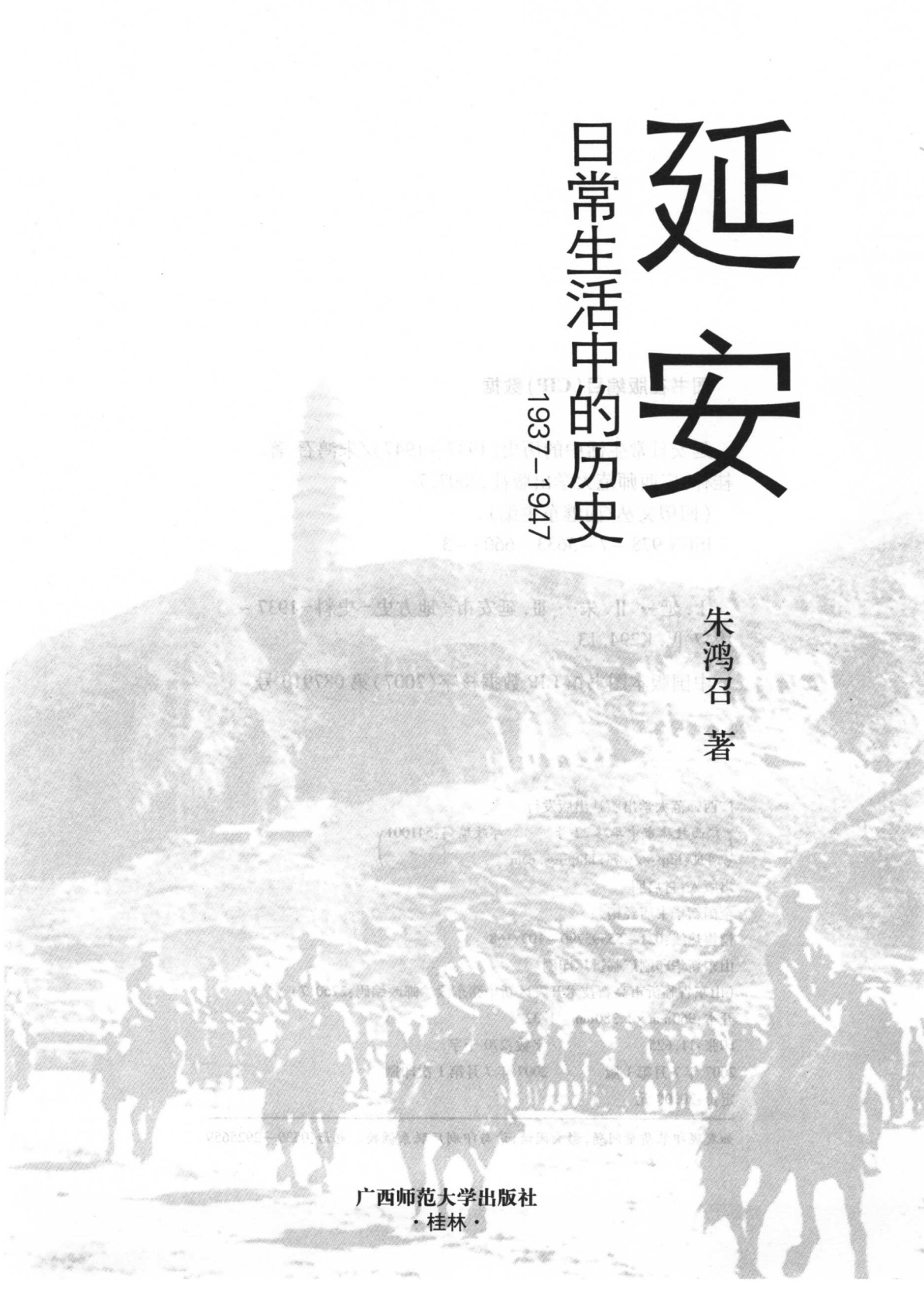
延安

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37-1947

朱鸿召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回望文丛/向继东主编)
ISBN 978-7-5633-6603-3

I. 延… II. 朱… III. 延安市-地方史-史料-1937~1947 IV. K29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791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中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80mm 1/32

印张:11.625 字数:270千字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659

自序：“五四”过后是延安

朱鸣召

我们早已关注“五四”，我们刚开始关注延安。

从“五四”到延安，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河流拐了一个弯。

十年延安时期(1937—1947)，不仅规范制约了此后半个多世纪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死浮沉与歌哭，而且重新阐释了此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重新规划了中国古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还重新描述了世界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

立于又一个新世纪之初，回顾刚刚成为过去，还带着我们父辈、祖父辈体温的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具有思想文化史价值意义的时代，只有“五四”和延安。“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20世纪中国的历史因此而溶入我们的血脉，凝结着我们父辈、祖父辈的泪水、汗水和血水，吸纳了我们几代人发自心灵深处的风声、雨声、咆哮声、厮杀声、欢笑声……

这种人，就是近现代中国读书人，现在通称的知识分子。

发现人，是寻找历史遗嘱的执行人。经历过19世纪后半叶中西方商贸、炮火和文化的交流来往，中华民族危亡日渐加重，历史的遗嘱在等待执行。清末一系列新政运动，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但被一再拖延，最后胎死腹中的政治变革，导致一而再，再而三的武装斗争、军阀政治。旧秩序已经破坏，新秩序还没有形成，科举制度废除，斩断了中国读书人与原有社会政治体制的必然联系，他们成为一群飘忽不定的自由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进化论旗帜下，寻找已经接受或正在接受西方新文化思想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作为引领时代发展方向，担当思想解放、文化解放，创造新人生、创造新社会的

历史遗嘱执行人。

尽管脐带斩断，血脉相通，这些新式知识分子骨子里流淌着浓厚的传统中国文化习性。但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已经具备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铮铮傲骨，“大胆地设想，小心地求证”的科学态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浩然情怀。他们在“五四”之后，担当道义，抗争强权，呵护天下良知和黎民百姓。

改造人，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经历过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进入革命队伍里的新知识分子，率先接受洗心革面的人生改造。在阶级论思想指引下，无论你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必须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是此后几代中国读书人唯一可走的人生道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发现了人而创造了 20 世纪前半叶历史，延安时期因为改造了人而创造了 20 世纪后半叶历史。并且，因为改造人，重新塑造人，延安改写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这是怎样一段惊涛拍岸、波浪滔天的河湾呀！

本书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就延安时期的某些历史关键问题或趣味敏感话题，作溯流探源与疏浚流程的工作，借以考察改造、塑造我们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集体生活规则，探讨制约、规范我们几代人思维言说习惯的集体记忆法则。

延安十年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当代性，远远超出了“五四”。我相信，清理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遗产绕不过延安，建设 21 世纪中国社会文明进程同样绕不过延安。我希望，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人都关注延安、思索延安，以此作为我们今天选择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的逻辑起点。

盼望呼应，期待批评。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E-mail: zhuhongzhao@vip.sina.com

2007 年 5 月改定

目 录

自序：“五四”过后是延安	1
--------------------	---

饮食篇

考察延安生活的物质方面,基本人口构成、工厂、农村、
军营等,贯穿着一个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主题

延安生活指数	3
工人有什么才来劲	33
改造“二流子”	57
把日本战俘变成革命战友	66

人文篇

考察延安生活的文化方面,医生、文艺工作者等,探讨文
化人在革命阵营里的精神思想特征及变迁,探讨改造
人、重新塑造人的实现途径

延安医生“告御状”	89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	106
秧歌是这样开发的	123
晴朗的七月十五日	154
黑色的七月十五日	185

男女篇

考察延安生活的情感方面,女同志、恋爱、婚姻等,探讨

改造人、重新塑造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 飒爽英姿是怎样炼成的 213
- 飒爽英姿炼成之后 235
- 延安交际舞始末 259
- 恋爱中的枪声 277
- 附录:《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书》 291
- 补记:刘茜的家庭与出身 294

风物篇

考察延安生活的环境地理,审视这些被改造、被重新塑

造的人生记忆法则,探讨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主题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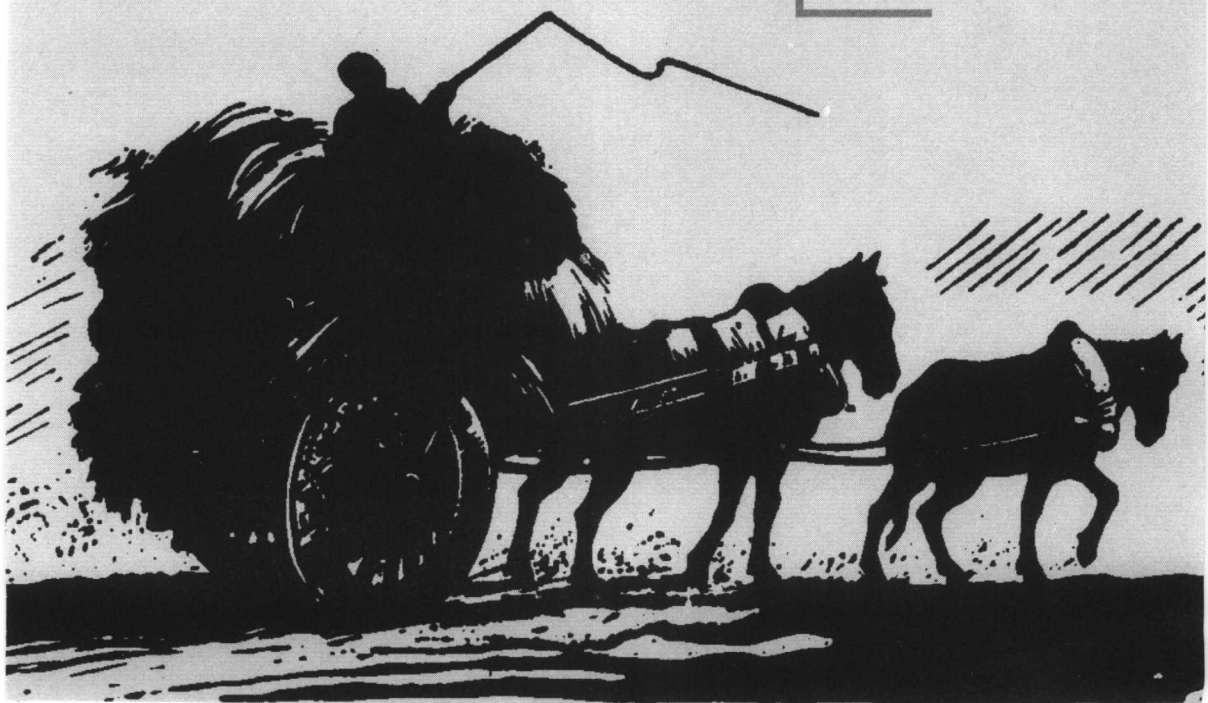
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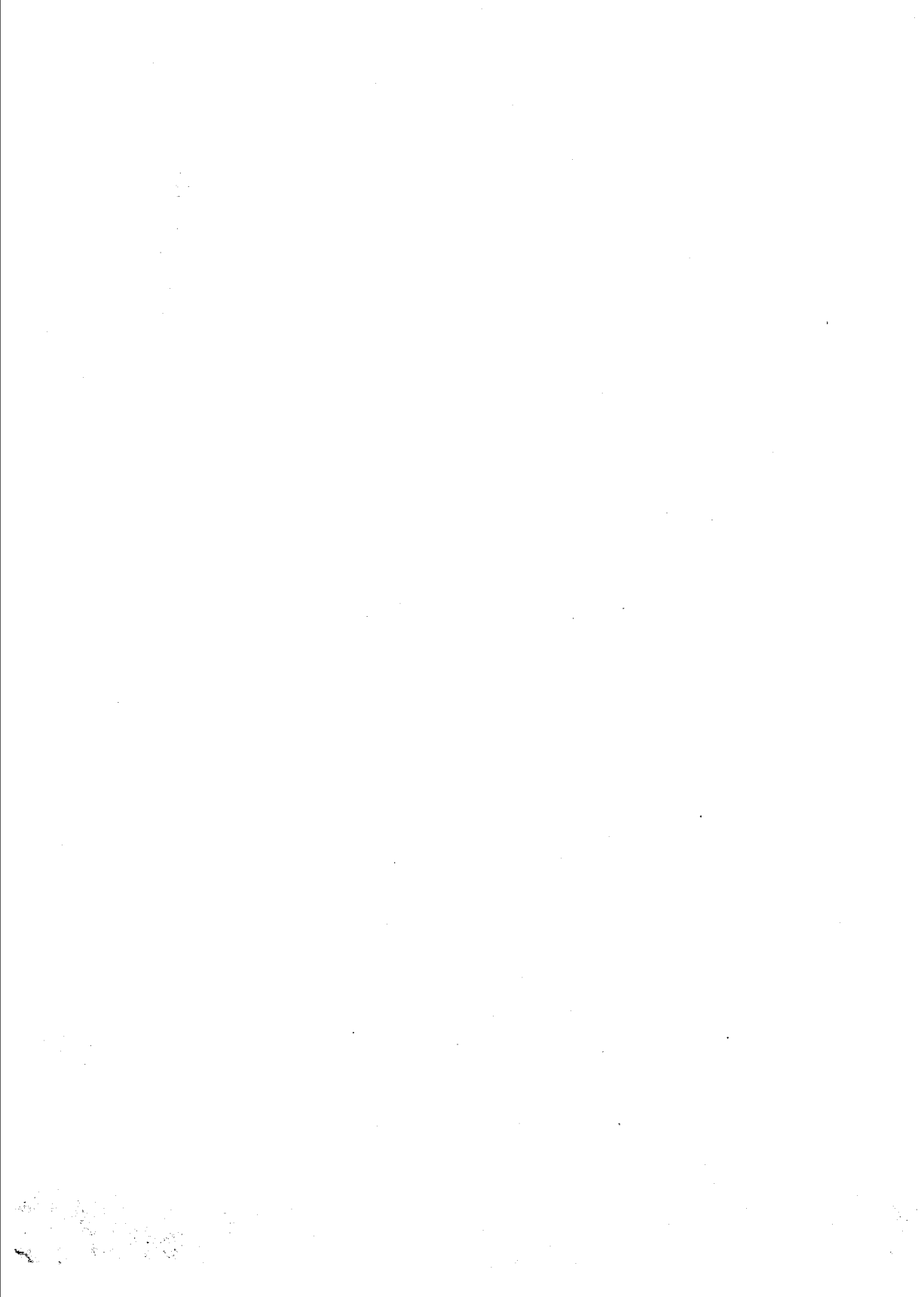
- 关于宝塔山延河水的万千说法 301
- 狼与虱子的生死浮沉 337

- 后记:缘于南京路上的思考 356

饮食篇

考察延安生活的物质方面，基本人口构成、工厂、农村、军营等，贯穿着一个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主题。





延安生活指数

延安十年(1937—1947),将一个陕北小镇打造成革命圣地,并因此而规范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改写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篇章。走进历史的生活是崇高的,但融入生活里的历史却往往是繁杂琐碎的。

一 人口与性别

人,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同样是人,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战争年代和医疗卫生条件极不发达的地区,人是一切资源中最可利用的因素,也是最可宝贵的因素。延安,自古就是边陲要塞,位于汉族与匈



宝塔山下,延安曾让世界为之瞩目

奴等北方少数民族交流杂处的前沿地带。清末以后,这里战争频仍,十室九空。1935年10月,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到达陕北后,当务之急就是“扩红”——招募青壮年人口参加红军,补充长途跋涉而锐减了的部队编制和战斗力。此后的十余年间,陕北延安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大量吸引人才,更大

量地招募移民人口。革命圣地延安的历史,就是由他们直接参与打造的。

1937年1月,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随红军主力部队进驻延安。当时,延安城本地居民大约3000人。“在露天集市上,农民和商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还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几座有名气的饭馆,仍旧照常营业。总之,延安呈现着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而此时部署在延安的共产党守备部队实有兵力总计4000—5000人,共分为5个团。1938—1939年边区与国民党军队开始发生摩擦,从前线撤下3个团来加强守备部队,使其兵力增加到6000—9000人。^①



1937年的肤施古城,依山傍水,气势巍峨,依然保存着作为古代军事要塞的庄严气象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的实有人数是7.5—8.1万人,战斗部队编制为5个军团。所有参加长征的人,身边带有大约可以用两个星期的给养,主要是大米和食盐。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剩下7000—8000人,其中正规部队战士约5000—6000人。

1937年8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将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陕

^①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39、254页。

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共4.6万人,开赴华北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抗日。在延安的各师留守部队组成“八路军留守兵团”,总人数是1.6—1.9万人。同年9月,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八路军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集团军”。稍后,八路军留守兵团与第一二〇师等部队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1942年5月,在延安的党政干部有1.2万人,陕甘宁边区民众人口约160万,军队约10万人。^①

1943年8月,在延安的党政军人数有3万人,老百姓约1万人。^②这相当于1937年延安市区人口的16.67倍。

1943年12月2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就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发言,其中介绍: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19%,高中占21%,初中占31%,初中以下约30%。这些知识分子到延安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就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或其他根据地工作,部分人留在延安工作。

1946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提供的确切统计资料显示,延安市区老百姓人口总数为1.237万人,陕甘宁边区人口总数为159.395万人。这是不包括党政军学等“公家人”的。同时,据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统计,1937—1945年间,边区共接受移民6.385万户,人口26.662万。外加5000多人的还乡难民,人口总迁移量达到31.662万人。安定县(今子长县)四个行政村原来只有173户,到1941年短短几年时间就增加到288户。^③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先进模范村的延川县刘家河村,1937年只有5户人家,62口人,到1943年就增加到12户人家,105口人。^④在这十年里,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持续在5%—20%之间,属于典型的非自然增长状况。在1946年的边区农村总人口中,全劳力就高达33.876万人。这种以移民为主

① 参见唯木:《当前的剧运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5月19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中央档案馆存。

③ 《边区人民生活日趋改善》,《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9月22日。

④ 《刘家河村被誉为丰衣足食模范村》,《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9月23日。

体的人口迅速增长,为农业生产和兵力补充提供了可靠有力的保障。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延安,其边区人口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发展生产,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反对堕胎,加速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力吸收各类人才,大量招揽各种移民,增加人口。1943年2月22日的《解放日报》载文说:“我们不怕来的人多,愈多愈好,我们只怪历史上给延安县遗留的人口太少,给我们发展生产许多困难。假如在二三年后,延安人口达到十万以上,那我们的工作将是另一番现象。”

上述边区人口中,农村老百姓无论是原有农民,还是招揽来的移民,其男女性别比例大体上是平衡的。1945年10月边区选举委员会统计的边区人口总数中,男性8.440万人,女性7.500万人,男女性别比为1.13:1,属于正常状态。可是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中,男女比例却严重失调。

1938年前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男女比例为30:1。几年过后,到1941年前后,男女比例稍有缓解,为18:1。再过几年,情况更向好的方向发展,1944年4月,男女比例为8:1。^①这个比例关系基本维持到1946年开始逐渐撤离延安。

形成这种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关系的原因,是长征到陕北延安的革命队伍,绝大部分都是男人。一大批青年学生为了抗战,从沦陷区、国统区和大后方奔赴延安,献身革命,才缓解了革命队伍里严重倾斜着的男女性别比例关系。“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②

1938年9月,时年19岁的孙承勋(何满子)经武汉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高级班第六队学习。此前在武汉抗日救亡活动中,他认识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学生郭维琼,同样也到延安,进入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他们之间保持着亲密的通信联系。大约半年后,他忽然接到她

^① 参见朱鸿召:《延安文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88页。

^② 梅剑主编:《延安秘事》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445—446页。

的告别信,说组织安排要她陪同一位老干部到晋察冀边区前线。“‘陕公’与安吴堡青训班常有人来往,我得知一些情况,知道我们的关系完了。”^①此事对他打击很大,他感到再也不能待下去了,随即离开延安。半个多世纪过去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和这件事,以为自己“由此而学懂了一点人生的、社会的内核性的东西”,“看到了一个胚胎,一个雏形,由此而领悟了社会的结构和运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虽然“这点获得极难用文字表述”,但对他自己人生的影响却是至深至远的。“我真切地自我审察到,从此就添加了一些虚无气,对生活的执著也添上了虽然是轻度的怀疑和渺茫的色调。这对我以后的生涯影响极大。我常为克服附在我身上的这个消极性幽灵而付出精力,到底没能尽根制服庄生式的对人生的玩赏态度。”^②幸许怀疑与玩赏的人生中会伴生出几分旷达与超脱,毕竟有违公正,暗影出没,让人耿耿于怀。

二 时间与食谱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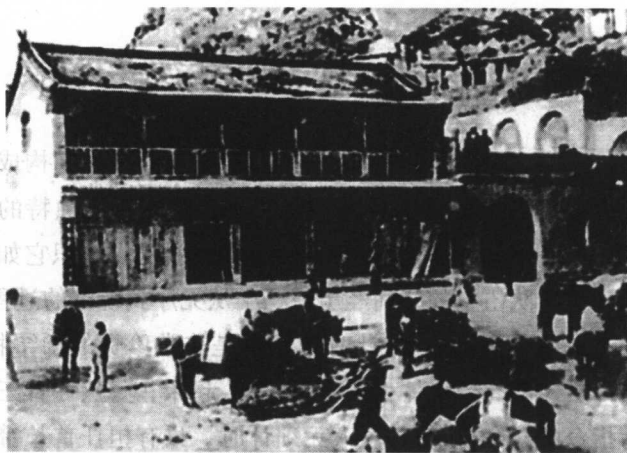
时间是人类文明的坐标,人们用不同的态度对待时间构成了这个世界不同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时间指纹。认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其实就是去认识它如何使用时间。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时间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统一的过程。

长征过来的革命队伍里,计时的钟表是非常珍贵的稀罕物件,只有战斗指挥员才配有。集体生活作息时间,起床、熄灯、一日三餐都是以号角为指令的。令行禁止,个人无须计时。只有担任首长警卫任务的战士们,需要计时轮换岗位,便以焚香为准,大约一炷香一个小时。而一些学校的作息时间,干脆以领导者或值勤者观测太阳高低,日暮晨昏为标准,随意性很大。遇到集体活动、庆祝盛典、群众集会,就并无定时,什么时候主持其事的领导人到场,便什么时候宣布开始。这在革命队伍里一般战士或工作人员并不觉得有什么妨碍,相反,领导人没有到场前的时间里正可以互相“拉歌”,热闹一阵子呢。

① 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6页。

② 何满子:《鸠栖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37—138页。

但因为有了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便感觉到了落后和不习惯。曾经留学法国近十年的陈学昭就公开批评延安,“开一次会,要是有几个人的话,等待开会的时间往往可以和开会本身的时间占得差不多,就是说:两小时的会,要等待两小时。听报告也是如此。我的经验是听报告两小时的话,等待了一小时半到两小时,就已经感到疲乏,而不能集中精神去听报告了。”^①也有领导同志偶尔号召大家遵守时间,但大家已经相习成风,没有时间概念,或时间概念淡薄,彼此遵守的只有革命队伍里的号角和领导者的指令。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把自己所有活着的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事业的革命者,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分子,其一切行动都听指挥。只有那些将自己生命当作个人财富,或者是更广阔的人类财富的知识分子们,才觉得“不重视时间,不遵守时间,不抓紧时间,也就是浪费时间”。



位于南门外新市场附近的南区合作社门市部,是公有制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两种对待时间的不同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便产生了心理矛盾和思想冲突。随着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以及医学、通讯等现代科学事业的出现,他们对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时间浪费现象也就意见越大。“在延安我们缺乏足够的钟表。即使有钟表,亦无标准时间,往

^① 陈学昭:《时间》,《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1月16日。

往相差到一、二小时,以致开会或听报告总不能按时到齐,前后浪费很多时间。”^①钟表不能普及,那么,最可行的办法是制作沙漏和日晷。

1939年11月7日成立的中央医院,采用的是与李鼎铭先生所擅长的中医完全不同的西方医学,诊断、治疗、化验等操作过程都需要精确的时间计量。医院筹办之初,他们在延安城南门外的新市场买到一个旧闹钟,如获至宝。他们在化验室窑顶上悬挂一个大铁圈,由办公室专人负责看着闹钟按时敲点。“于是仿效外洋轮船报时的方法,从晨五时到晚十时,每小时报一次时间,以四小时为一组,一、五、九同样报法,二、四、十也同样报法,使大家心中有数,听者不会误会。”^②不久,宋庆龄托人带来几只手表给中央领导,毛泽东得知医院需要,就全部给了医院,戴在各科室主任手上。但一来僧多粥少,二来坏了没有人维修,所以刘允中医生便制作了沙漏。

从延河边找来细白均匀的沙子,放在细长的中间束身一次只能流通过一粒沙子的玻璃管中,计算出一秒钟流通过的沙子数,装置一定的沙子后,再将玻璃管封闭即可。有15秒与30秒两种,使用时可以来回倒两次或四次,便是一分钟的时间。开始在医院里使用,用以计算呼吸,数脉搏。后来大生产运动中,在1943年6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予以介绍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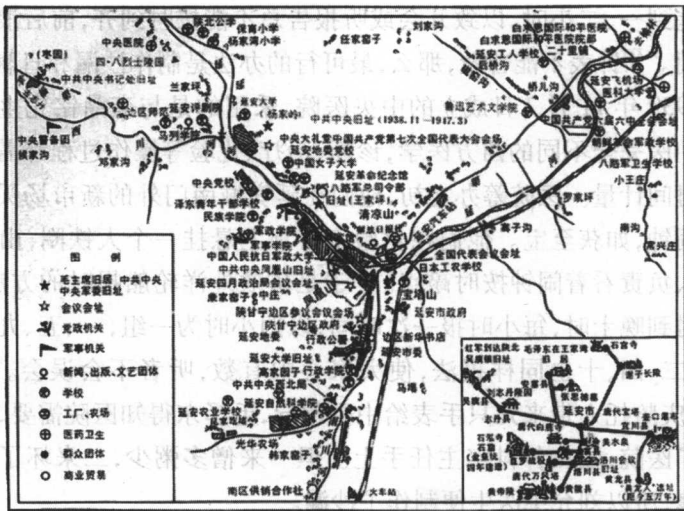
沙漏适宜于室内精确细小刻度计时,室外大刻度计时是日晷。1942年8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边区数理学会的孙桐计算太阳与时间的对数,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物理系江天成校审并设计出石质日晷。然后,由自然科学学院、边区政府和延安市政府资助,翻刻制作出两个大的石质日晷,分别安置在自然科学学院内和市南门外新市场沟口。^③在当时条件下,此举堪称是对两种不同时间态度的最佳调和办法。随即,延安的很多单位,如杨家岭、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也都陆续安装了这种形式的计时工具——日晷。

其实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中,尤其是先后从苏联回来的领导

^① 江天成:《延安日晷与地方时》,《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9月30日。

^② 何穆:《延安中央医院是怎样创办起来的》,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5页。

^③ 当年安置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日晷,1947年3月为躲避国民党进攻,曾经被埋藏在地下。1953年被重新挖掘起来,并被征集为革命文物,至今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延安主要革命旧址示意图

10

人,不是没有钟表,而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1944年5月,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帮助建立广播电台的英国人林迈克(Michael Lindsay)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初到延安时,那里还没有标准时间。有些单位使用中国东部的华东标准时间,有些单位则使用华中时间,而延安地方政府则在他们的院子里安上一个日晷,时间是以太阳移动而决定的。这样多的不同标准时间当然会引起混乱。”由于他的工作是建立电台,并负责接受并联系外地电台,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于是,他致信毛泽东。“结果毛泽东先生让他的一位秘书给在延安的各机构打电话,询问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时间最好。过了几天《解放日报》登出了一条新通知,规定延安就使用所处时区的时间,即中国中部标准时间。”^①

延安当时不多的钟表都在中央领导人手上,他们分别从南京、武汉、重庆、莫斯科等地来到延安,然后各自主持某个部门的工作,便使得不同的单位使用不同的标准时间。而毛泽东本人,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整个地将白天与夜晚颠倒过来,特立独行地按照自己的生活习

^① [英]林迈克:《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6月版,第101页。